

献给一亿大中学生

我的 大学时代

(K3)

名人回首往事沧桑

纸短情长献给你我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WODE DAXUE SHIDAI

我的 大学时代

策 划：阙国虬

责任编辑：成知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时代/徐中玉等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2

ISBN 7-5334-3112-X

I. 我… II. 徐… III. 名人-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149 号

我的大学时代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 0591—3726971 3725592

传真 3726980 网址：<http://www.fep.com.cn>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350005）

850×1168 32 开本 9.625 印张 233 千字 3 插页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300

ISBN 7-5334-3112-X/K·73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徐中玉	我的大学时代	2
	——读过山东、四川、中央三个国立大学的 中文系才毕业	
钱谷融	我的大学时代	27
汤定元	我的大学时代	47
何祚庥	参加清华大学地下党活动回忆片断	57
	——沧县行	
潘家铮	不堪回首忆当年	81
	——我的大学生活	
茅于轼	我的大学教育和我的事业	99
叶 楠	我是个永远的肄业生	107

谢冕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119
钱中文	往事与反思	128
	——大学生活琐忆	
潘旭澜	毕业照	152
叶秀山	不知说些什么的大学生活	163
童庆炳	青春无悔	174
童道明	我的拉克申老师	181
何镇邦	难忘的复旦园	187
	——记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钱理群	四十年前的“历史叙述”	204
	——关于“我的大学时代”	
谢天振	一波三折的大学生活	215
赵丽宏	不老的大学	232
毕淑敏	第29种元素	249
张汝伦	我的大学	269
陈思和	遥忆大学路	276
莫言	我的大学	282
许纪霖	我的精神摇篮	289
	——回忆大学年代	
编后记 成知辛	303

徐中玉 1915 年 2



月 15 日生，江苏江阴人。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业。历任中山、中正、山东、同济、复旦、沪江、华东师范等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34 年开始写作，1941 年开始执教。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作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原国家教委全国高教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兼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现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系主任。撰著主编书刊数十种。曾二次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等讲学。

任福建教育出版社《20 世纪中国学术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大典》文学卷主编。

我的大学时代

——读过山东、四川、中央三个国立大学的中文系才毕业

■ 徐中玉

一、为什么会去山东大学

我是 1934 年暑期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在此之前，我当过两年小学教师，在故乡江阴城区“澄南小学”教五、六两个年级的语文课，兼任教导主任。因我是江苏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的毕业生，必须凭在小学服务满两年的证明书，才能报考师资设备好、每年学费只要 24 元的国立大学。那时全国只有 13 所国立大学，山东大学是其中之一，设在青岛，原名国立青岛大学。因经费要改由山东省承担，而山东省政府乃在济南，青岛只是特别市，地点吸引人，山大不愿搬去，故只有校名改称“山东”，山东省才能勉强满意。我初中毕业时即因家里负担不起上高中普通科的学费，而师范科

既免学费还免膳费，才进了师范科。师范科毕业后如想升学，去考私立的和教会大学，则无此限制。家里负担不起那些年约 400 块大洋的私校费用，我就只能等待两年后考国立大学了。国立大学录取率约为 20 : 1，我并无把握。高师时期我不喜数理化，英语只能学一年，因为得多读教育学等课程，我文、史、地还可以，所以两年小教时期课余便尽力补读英语，以及代数、几何。许多人看不起小教。我总想升学。“小教”月薪 24 元，除去伙食每月 5 元，大致可余半数。家里可不用我的钱，便储存起来，准备考入大学后，自己维持一年。那年山东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设有考点，我就是在上海应试的。山大文科这时已只有中文、英文两个系，原有的教育系已撤消。我自然只适合考中文系。我还从未走出过苏南——无锡、上海、南京这一带，山东更未去过。决定只考山大，现在想来，这一决定可说基本已确定了我一生的走向。这并不只能说只是我的性格。

因我大姑母家的表哥郭斌和（治周）清华公费留美哈佛大学回国后，就在国立青岛大学英文系任教授。他和英文系主任梁实秋，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等都是同时留美的老朋友。我听他盛赞青岛的美景，又说山大文学院师资很好。我从未远出，如考进山大，有表哥在那里，家里放心得多。还有，比我高一两班的锡师同学，已有三位在山大读生物系和英文系，也鼓励我去，以后寒暑假即可同去同回。我考数学只代数、几何尚可，英语凭记住的一些文字凑数，文、史、地还可以。考后在家等待时，天天惴惴不安，愁着如果考不取怎么办，因已把小学教职辞掉了。幸而终于盼到了

录取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记得那天正在院里吃夜饭，远远看到邮递员正在进来，送一封挂号信，我马上奔去接，心里直跳，一看正是山东大学寄来的。原来，通知“不录取”，不会寄挂号。自然是大喜讯。天哪！果然是。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都以前所未有的热烈为我高兴。此情此景，时隔 60 多年了，他们都已去世，还如在眼前。

但当我正将去青岛时，却知我的表哥已转去清华大学任教了。青岛大学当局未能阻住大学生强赴南京要求抗日的请愿，受到国民党政府严责，坚决要开除为首学生，引起了罢课。校长杨振声，教授中大多数包括梁实秋、闻一多等在内不主张罢课，引起更大风波。结果还是开除了一些学生，而杨、梁、闻等以及当时任中文系教员的沈从文、方令孺等，都转去北大或清华了。我的表哥不久也决定改去清华。我就只能与老同学一起，在上海搭上日轮“大连丸”去青岛入学。就这样，终于实现了我升学的愿望。那年我不足 19 岁。

二、我的思想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在无锡读书时，激于义愤，也参加无锡学生队伍赴宁请愿抗日，看见过蒋介石，听了他在中央军校的“训话”。与虎谋皮，当然无功而返，却增重了对国事的十分忧虑。读小学时我们的级任先生教语文课的陈唯吾老师，极受我们爱戴，中途突然离校，失踪了。后来听说他已被杀头。传说他是“共产党”。很长时期，我一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直到

解放后，才在江阴烈士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和事迹。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在一次领导“农民暴动”中被抓去，真的是被“杀头”了。读初中时我有惊无险知道在今张家港市杨舍镇半夜里附近农民队伍惩治了一些地主、当铺老板，我们是在镇郊学校里，天明后才去镇里看了一些现场。仍不全懂是怎么回事。劫富济贫？读师范时经过赴京请愿后订阅了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才稍为知道了一些世事，感到应该进步，痛恶不抵抗主义，忧虑国弱民贫。也读过生活书店出的一些进步小册子，只能说稍为开窍了些。我两个姑母家的两个表哥（另一个郭斌佳）都是因读书勤奋突出，从中学起就连得奖学金进大学，终于都考取了清华公费留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后回国任大学教授的。我家近亲中无一经商或做官，只有勤奋读书这条路被认为最理想。我不如他们，但思想里家庭和我自己同样重在好好读书，读书救国。初中时期没读过新小说，在无锡时才读到一些，后来还订阅了一份《现代》。爱读小说，不大看理论文章。开始为县报、校刊写点短文，下乡宣传过抗日。对国事主要想到抗日御侮，绝不能被帝国主义者“瓜分”，其它不大清楚，也不求甚解。

到山大后，开头除听课外，我下午、晚上去图书馆为多。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的报刊、书籍，大大开了我的眼界，自己没真读过什么好书，明白了自己多么寡陋。山大中文系文科教授大多原出身于北大、清华，都是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在时来的，游国恩、彭仲铎、萧涤非诸先生是讲师，张煦（怡荪）、姜忠奎（叔明）、丁山诸先生是教授。大学教师一上来就讲他们的专题研究心

得，不根据教本，往往还并无讲稿，只用一些板书，要求我们自己去看参考书。刚上来实在抓不住要领来不及记录，只好课外去寻些有系统的书看看。这就要自己去查书卡，借书，翻工具词典。很艰苦，但多少有点自学能力是这样摸索出的。青岛地处华北范围，又是日本侨民颇多之处，海边还经常停有日本兵船，日本浪人常故意肇事。华北局势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切肤之痛远比长期生活在江南一带重得多。一面是学习负担不轻，一面又得预想到第二年的学费来源，不能不想向报刊投稿，便试着准备起来。那时我们注意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和《益世报》较多，北平的《华北日报》、《世界日报》次之。觉得那里副刊每天一大版，容量大。青岛本地报纸六七家，稿费极少，甚至不给，影响又小，写了多向天津、上海寄。上海的最大刊物有《东方杂志》，后来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等。我不会也写不好小说，主要写些短文、散文。多少只有点当小学教师两年的生活经验与社会、书本知识。学习负担，经济准备，加上时局紧张，一天比一天安不下心来。以后学习逐渐上了轨道，文稿有些退回、有些发表了，对时局的关心也更增加了。触动较大的是参加发起建立了“山大文学社”，开始受到社内一些进步同学、还有不少后来知是“民先”成员和甚至已是地下共产党员的无形影响。社中不少并非中文系同学，理工科的不少。我们在青岛《民报》办了个《新地》文学周刊，由我和中文系东北同学蔡天心（建国后任辽宁作协副主席）共同负责。我们时常一起座谈，一起出去野餐。二年级时老舍师到山大来任教了，第

三年叶石荪师、台静农师、颜实甫师也来山大了。洪深师是英文系主任，排练《寄生草》一剧时找我帮他做“提示”以及别些杂事。老师们有时也参加指导文学社的活动。参加文学社使我交到了不少进步同学，开拓了我的视野。明显感到他们对抗日救亡问题特别关心，知识多。我又参加了他们的读书活动，很觉新鲜。中间直接感受到“西安事变”发生后大家震动的紧张情绪。激烈的以“除蒋”为快，大多数同学顾虑一旦爆发内战，就谈不上抗日了。和平解决，觉得还是共产党明智。此后进步同学发起的各种救亡活动，我参加增多，如一道下乡去崂山一带演街头剧等，深受感染。这都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后的情况。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仍循例南归探亲。战事扩大后，我坚决仍回青岛，以为还可能开学，因只剩一年就可毕业了。战局不断扩大后，山大奉命南迁芜湖，我任学生会负责人之一，随校南迁。另两位负责人原来是“民先”的山大负责人，途中他们邀我参加“民先”。我因相信这两位同学，虽对“民先”历史并不很了解，仍欣然同意了。在南迁过程中，我在芜湖、安庆、武昌三地随队逗留期间，都随他们同去当地的“民先”联系地点交流，在武汉还去看望过沈钧儒先生。此时忽从报上知道“民先”已宣布停止活动，当是上面的协议等。以后这两位进步同学决定即赴山西及陕北，未再继续随校入川。其中一位王华美建国后任过党的西安市委书记（丛一平），曾又欢聚，此乃后话。我略知“民先”是当时党领导的青年学生组织。后来由于他们两位已走，不了了之，我就再未参加过类似的这种活动了。山大继续入川到万县时，教师同学已只剩

百余入，复校无期，这时知道叶石荪师已在成都四川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蔡天心同学已在川大中文系借读，要我也速去川大借读，免致耽误荒废。于是我就离开万县，经重庆去成都，办好了在川大中文系借读的手续，住在成都皇城里，时间是1938年初。春季开学时，我听过川大向仙乔、林山腴两位老师的课，两位都是四川的著名教授，旧学根底很深，学风显然与山大不同，重在传统。互相比较，我也有很好印象。可是很快便收到山大与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暂时合并的通知，在外借读的学生可仍去中大。我反复考虑，一因重庆熟的同学多，二因表哥郭斌佳已从武汉大学教授转到重庆担任外交工作，是惟一近亲，所以决定仍去中大。去时春季已开学上课，说定可先读四年级下学期的课，秋季补读四年级上学期的课，读完可先行离校工作，正式毕业则定为1939年7月，比山大应在1938年7月，迟了一年，因迁校时已在路上化掉一学期时间。我与后来去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周法高、李孝定两位是中大同班同学。由于有以上一些经历，到中大后，可能由于三年来已在《东方杂志》、《国闻周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等刊物，以及稍后的《七月》、《光明》、《抗战文艺》、《抗到底》、《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承同学们厚爱，推我担任中文系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的研究部长。成立“中大文学会”后，又被推为主席，实也由于进步同学们的大力支持。因“中大文学会”和“中大经济问题研究会”、“中大社会问题研究会”，是三个以进步同学为主体的学生团体，同学们可能从我发表的文字中了解到我有些进步的倾向。当

时我同中大的陶大镛、陈元晖、勇龙桂、郭圣铭、莫绍揆等都很熟。直到建国后，我才知道，中大党组织略知我的经历，所以支持。但我重视专业，喜爱写作，又即将毕业离校，所以确也未曾想过参加组织的问题。事实上，我对共产党虽已渐有所知，却也顾虑规矩很多。加上与表哥见面时，他几次告知其从政的经验，说政治太复杂，国民党内党棍多，没有意思，千万不要参加到任何组织中去。在重庆我只由老舍师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为理论研究组的一员，出席过几次讨论会。我为“中大文学会”邀请到了郭沫若、老舍、胡风、陈西滢四位先后到中大来演讲，有很大影响。我基本上只积极主张抗日救亡，读书、救国，要求社会进步，不大去想别的问题。理想的职业是步两个表哥后尘，研究学术，争取将来当个比较自在的大学教授。先此老同学蔡天心已去延安了，建国后知道在我离开成都，他回重庆任职后不久就成地下共产党员了。我敬佩他的勇敢，一直保持与他通信。但我仍喜欢走读书研究的路，不想经商，也无意做官。这在当时也是两个热点。

1939年初我先行离校，应山大颜实甫老师之约去成都的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研究中学语文教学。我对这工作不感兴趣，很不对路。两月后，颜老师被任命为重庆郊外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在此之前，迁到在云南澄江的广东中山大学研究院在成都招考研究生，我正有志继续深造，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就应了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的考试。颜老师非常开明，一方面邀我到教育学院当秘书，也教点课，另一方面又预先答应我，如

考上了，仍去深造，一定放我走。研究生很穷，云南又荒远。在重庆教院，地点和生活都好得多，到教育学院又不满两个月，我终仍决计离开重庆，一个人到中山大学去当研究生了。我不愿研究我没兴趣的问题，叶石荪老师早把我吸引到古今文论的研究领域。我也不愿老坐办公室。我孤身一人经昆明到达澄江小城，在城外一座破庙改成的文科研究所里，白天是在荒山，夜间是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读宋代诗论。重庆、成都、昆明是当时后方的大城市，这里只是荒僻小城的寂寞山野。我从未懊悔这种选择，觉得还是这种生活好，简单一些。中山大学研究院分成三处，文科研究所全部只有十几个同学，报纸两天后才只能见到昆明所出的，没有什么其他讯息。生活圈子限在极小的范围内，专门读书。粗茶淡饭，我适应下来了。

回顾我那几年的大学生活，历经三所国立大学，身经目击“七七事变”前后情况以及迁校入川的种种磨练，思想上有所变化，行动也逐渐改变，对抗日救亡是积极的，对写作是积极的，对政治真相实际仍隔膜，不求甚解。厌恶国民党那些党棍，敬佩牺牲了的共产党员，自己却仍愿生活在学校环境里，读书求学，不想参加什么实际政治活动。大概有些进步同学也看到了我这种性格。两个表哥是我近亲中的有力榜样。此时我的大表哥郭斌和先在清华、中央两大学外语系当教授，这时则在迁于贵州的浙江大学兼任外语、中文两系的主任。他一直专研古希腊文学，与“学衡”派诸先生交往密切，是美国人文学家白璧德的学生。我虽不了解两个表哥所学的希腊文学与西洋史学，却对他们所走的生活道路是

向往的。我这条生活道路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山大几位老师的影响，后面会再谈到。

三、我的学习与老师们

在山大学习的三年，我印象极深、相熟的老师也多。在川大只借读过两个月，时间太短。在中大一年，也有很深印象，得到几位老师的亲切帮助。

比较起来，我喜欢山大中文系的学风。山大比较开放，我接受的现代教育观念多些。这同中文系老师大多受过西方教育，思想观念、治学方法与传统有异不无关系。系主任张煦先生给我们讲庄子，四川人，讲授得非常生动。听说他在北大读书时，有次与别人辩论老子，极得梁启超赞赏。姜忠奎先生也是北大出身，听他讲文字学，有板有眼，似很传统，却含有新意。丁山先生是古代史专家，给我们讲中国通史，上课只带几支粉笔，滔滔不绝，他来自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游国恩先生已出版过楚辞研究专著两种，思路清晰细密，循循善诱，我们很爱听他的课。闻宥先生的语音学，中外汇通，我无意于训诂、音韵之学，对他的课仍有相当兴趣。台静农先生给我们讲诗经，给我们介绍崔述、方玉润诸家新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叶石荪先生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休假一年来山大。他曾留学美法两国，给我们讲文艺心理学，不但对外国文学，也对古代文论资料非常熟悉，自己能填词，有时就联系自己的填词经验，来论证研究心理学与理解文学的重要关系。颜实甫先生是留法十多年，治柏格森哲学的，这次才刚刚回国，给

我们讲哲学。罗玉君教授是留法的文学女博士，我国第一种《红与黑》的译者，给我们讲欧洲文学。后来的系主任施天侔与郝立权（房衡）两位先生都是老北大，施治中国思想史，郝治汉魏六朝文学。以后萧涤非先生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也来了。老舍先生则是来自齐鲁大学的著名小说家，我听过他开的“小说作法”与“欧洲通史”两门课。我还听过一年的“生物学概论”，做过解剖青蛙与草履虫、蚯蚓之类的实验。中文系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我就选了生物学。还须再读两年英文和一年日文。老师就是王哲安和周学普两先生。现在想来，山大当时已注意到文理结合，中外结合，本系选修课有各自选择的可能了。当时北方国立大学中文系尚未设立副教授，讲师以上就是教授，在讲师下，另有助教一名，坐办公室协助系主任工作，全系不过教授四五名，其余各级四五名，总数只有十名左右。系主任教两门课，其他凡专任教师都须教三门课。故人虽少，却能开近 30 门课。而我们每周上课的时数不超过 20 节，大致每天只要听三四节课，中间包括公共课体育。下午只偶尔有课，几乎都用来去图书馆自学。绝无像目前这样五天要上满 30 多节课的。大学生仍应重在自学，光凭听课，听太多的课而不自学，不能真有基础。理工科同学有实验、实习，上课比我们文科稍为多一些。

中文系同学在中学里读古书不多，为培养读古书的能力，一年级时被指定课外通读《论语》与《史记》两书，一定要上交自己重新标点过的这两本书，并写出简要的读后感。审查并不很严，但毕竟是读过了，比目前的连该读的都一本未读，显然有益得多。